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胡松涛：报告文学创作，既要写下历史的宏阔也要看见人间烟火

□本报记者 李晓晨 吕漪萌



胡松涛

对同一事件的反复书写,是走向“经典化”的必由之路

记 者:胡老师好!首先祝贺您的《遵义三日》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请问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从构思到完成花了多长时间?

胡松涛:非常荣幸《遵义三日》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创作了这部《遵义三日》。写这部书用的时间不是很长,一两个月就拿出了初稿。但对遵义会议史料的阅读和收藏,对遵义会议的学习与研读,在写作之前已经持续了30来年。关于遵义会议的相关图书,我的书房里有上百种。

记 者:“遵义会议”这个主题已经有众多的书写者,您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重写这段历史,还是需要一些胆识的。

胡松涛:对于遵义会议,有许许多多的讲述,党史的、学术的、影视的、绘画的、诗歌的……遵义会议精神是民族的财富,遵义会议的叙事也为所有创作者所共享。在传播史上,对同一事件的反复书写,是一个事件走向“经典化”的必由之路。一个“霸王别姬”的历史故事,司马迁《项羽本纪》以“史”的形式书写,唐代的杜牧、宋代的李清照等以诗词的形式书写,明代沈采的《千金记·别姬》以传奇的形式书写,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以京剧的形式书写,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以历史小说的形式书写,毛泽东在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对“霸王别姬”进行描述和解读……遵义会议作为一

个“经典”,值得反复书写。何以在今日的中国回首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精神中蕴藏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精神动力,《遵义三日》是新时代对遵义会议的深情回眸和文学的复原。

合理填补历史缝隙的“留白”,给读者留下涵泳思考的余味

记 者:《遵义三日》中,您在遵义会议前的三年、开会的三天和会后的三个月这三个时间框架里,对遵义会议这一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进行了深度还原和描绘。请问您为何采用这样的结构方式?

胡松涛:遵义会议可以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遵义会议指的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这三天的会议。广义的

场,我阅读了很多史料,通过征用其他文本资源,对比辨正、细心衔接,尽最大努力把模糊的事件厘清,通过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推导出合乎逻辑的历史现场。我最大的愿望是,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看到历史的景象,能听见历史的声音。

记 者:有评论家认为,《遵义三日》“纪史有细节,叙事见文笔”。有细节、有文笔,是这部书的显著特点,也是这本书好读的原因之一。在创作中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胡松涛:《道德经》说“复归于婴儿”。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语境,就是回到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回到现场,进入历史,需要通过人物、故事和细节来实现。我在创作《遵义三日》时,专注于用“我的笔”刻画人物,挖掘大历史中的小细节,不回避历史事件的复杂肌理,对一些敏感的故事、敏感的人物关系也不遮蔽。同时,对历史事件,我也努力进行积极的阐释,志

把现场写活,作品自然就能吸引人

记 者:在《遵义三日》之前,您已经创作了《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延安典故》《毛泽东文谭》《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等党史题材作品。这一类涉及党史的著作的写作难点主要有哪些?您是怎么处理的?

胡松涛:历史很生动,历史故事很好看。如果写不好,读起来就觉得隔了一层,不生动,不亲切,不感动人,不能深入人心。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比实际生活要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有普遍性。这“六更”对我的创作大有启发。我在创作这类作品时,始终努力防止“有时间,没有物候”的毛病,不仅要有准确的年、月、日,还要看到春夏秋冬的容颜;防止“有地名,没有地形地物”的毛病,注重空间叙事,注重地形地域的影响;防止和克服“有事件,没有故事”的毛病,注重书写历史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曲折和意外;防止和克服“有姓名,没有鲜活的人物”的毛病,要让读者看得见人物的身体,看得见人物的性格、性情、面部表情,以及他们的细腻情感;防止和克服“有政治,没有日常”的毛病,不仅写领袖人物等宏大叙事,还要看到平常人的面孔,看到人间烟火,看到那个鲜活的世界。我总害怕把非常生动的故事写空了,写枯燥了,写得不好看了。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好,有些文章自己都不好意思看第二遍,必须继续努力改进。

记 者:在您看来,重大题材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何写得好看,吸引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阅读兴趣?

胡松涛:革命历史、革命故事和革命人物,大家都熟悉,没有悬念。重大题材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不像虚构文学作品,有较大的制造悬念的空间。在没有悬念、不能虚构的情况下,怎么写好革命史?如何吸引读者?这就需要艺术上的创新和叙事上的突破。我在《遵义三日》《延安典故》中尝试深度回归历史现场,在老现场中发掘新故事,在老故事中挖掘新意义。所谓“深度回归”,不仅仅是对历史进行还原和再现,更要通过密集的情节细节,写出“亲历其境”的现场感。要让现场自带重量,现场可以载道。我始终认为,把现场写活,历史、人物以及理论便能生动形象地浮现在读者眼前,作品自然而然就能吸引人。

记 者:现在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因为很难采访到当事人或者见证者,只能主要根据资料或者说二手资料加上实地踏访来创作,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避免雷同或者所谓的“异曲同工”问题?

胡松涛:许多文学创作者,包括我在内,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时引用人家的东西,不注释标注出处,这是不应该的。抄袭更是不道德的。《遵义三日》一书,引用了近300条史料,一一注明出处,如何“引用”?“引用”哪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引用?这十分考验作者的眼光和视角。“引用”本身也是一种“创作”。瓦尔特·本雅明曾说,希望全部用看似没有关联的“引文”来完成一篇作品,但他最终也没有做到。众多作者写同一事件,如何在“同”中写出不同?靠文本的结构、靠史料的剪裁、靠作者的学识,还要看作者的文笔。

记 者:接下来您有哪些创作打算?

胡松涛:我正在创作一部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关的作品,目前初稿已经完成。同时,我还在写一部有关战争史的作品,预计篇幅在百万字左右。我希望把它们写得更接近真相、更好看一些。



胡松涛部分作品

遵义会议指的是以遵义会议为中心,包括遵义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遵义三日》这本书以“三日”为切入点,构建“动荡乾坤——三年多的磨难,造成遵义会议”“扭转乾坤——三天的磨难,完成遵义会议”“锦绣乾坤——三个多月的磨合,圆满了遵义会议”这样一个逻辑框架,建立起别具一格的“遵义会议时间”,拓宽遵义会议的历史空间。正是这样的建构,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前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急形势,描绘出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争相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书写出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

记 者:遵义会议的史料中,很大一部分是亲历者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年代久远、视角各不相同,难免会有相互矛盾之处。您在作品中是如何处理这些史料的?

胡松涛:遵义三天的会议,因为时局艰难,长征艰难,没有留下一个字的原始记录,也没有一张照片,只有一些回忆文章。因此,在历史的缝隙中,留下了许多“空白”。创作报告文学时,作者的一大任务是合理地填补这些“空白”。为了还原现

在展示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给读者留下涵泳思考的余味。

记 者: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是《遵义三日》的显著特色。因为真实,它可以作为生动的党史来读;因为富有文学性,它又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您在创作中,如何把握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胡松涛: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一个典范。在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中,如果充斥着概念,字里行间都是“大词”“好词”,便违背了“质木无文”的初衷。《遵义三日》在“挖地三尺”找史料、追求历史真实的同时,试图以新的叙事、新的节奏,以色彩斑斓的故事情节,表现遵义会议这个宏大的主题。行文中,我有时用历史考证之笔,有时用文化点评之笔,有时用军事观察之笔,书写对胜利命运与失败命运的反思,对个人命运与团体命运的思考。我希望写出一部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命运之歌,从而生动地表现遵义会议这个宏大的主题,形象地展现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我期望,《遵义三日》能以文学的光芒为遵义会议增加荣耀。

读者视点

用碎片搭一座桥——读莫言小说集《人呐》

在翻开莫言的《人呐》之前,对他那句“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并没有抱太高的期待。似乎作家和我们一样,都被困在算法的围城里,被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吞噬着专注力和思考力。但读罢我才明白,他没有抱怨时代,也没有坐等读者回归,而是决定用这座围城里的碎片,搭一座通向远处的桥。短视频的“刷”是一种随机切换的快感,而莫言深谙此道:“我相信你看了上一篇绝对猜不到下一篇我会写什么。”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人呐》的高明之处在于:每一篇小说看完之后,有东西会留在你心里,合上书页,那些鲜活的人物——假装成孕妇的人、和老虎搏斗过的人、演员、大师、网红、诗人、弄墨……还在你脑子里转,挥之不去。原来,这不是写作者向流量时代仓促缴械投降,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降维打击”——他用短视频最核心的“短”,包裹了文学最传统的“深”。坦白说,这本书也有让我觉得“不过瘾”的地方。有些篇章的确太短了,短到还没展开就结束了,像是开了个头就撒手不管。还有一些篇目可能过于追求“像短视频一样轻松”,导致深度和锐度都有所稀释。但仔细想想,这可能恰恰是莫言有意为之的策略——他就是在搭一座桥,桥的作用是让人“走过去”,而不是“住在上面”。如果你因为这本书对莫言产生了兴趣,愿意回头去读他的长篇经典,那这座桥就算修成了。(裴金超)

女性的力量与光辉

——读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阅读马金莲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像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进行一场漫长而深沉的跋涉。这部小说摒弃了新农村题材小说中常见的“驻村干部+农民”的叙事模式,让农民成为唯一的叙事主体。乡村女性也不再是传统叙事中被动、沉默的他者,而是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马金莲放弃了外在的戏剧冲突,转而深入人物内心的细微波澜,用密实的细节编织出生活的本真面貌。读《亲爱的人们》,不像在观赏他人的故事,更像是亲身走进羊圈门,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听着乡亲们用质朴的西北方言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名城市女性读者,我被这种“在地创新”的精神触动,进而开始重新思考当代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的共同困境。真正的女性光辉,不一定闪耀在轰轰烈烈的抗争中,更多时候蕴藏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体现在对家庭的无私奉献中,绽放在面对苦难时不屈的生命力上。《亲爱的人们》是对西海固农村的深情记录,也是对中国女性生命历程的深刻诠释,它让我们看到,在宏大的时代变迁中,女性的力量可以如此无声,又如此波澜壮阔。(曹蓝依)

日常生活里的诗性时刻

——读黑小白的诗

《黑夜和白昼》是诗人黑小白“黑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黑小白的诗歌以草原、村庄、庭院、亲人、泥土等日常意象构筑出诗歌现场,起于寻常但不止于寻常,所有的日常悲欢,都汇成诗意的光芒不断地漫溢。就意象的选择上来看,诗人脱离古已有之的“风花雪月”,把目光聚焦于时代的、现实的、基层的层面上。每一个寻常之物、之景、之场面,都有独特的神韵在其间流转,诗人只能观

察和捕捉它们。而文字就是连接诗人与诗意之间的望远镜或放大镜。在《霜降》《十年》《田野收留了一匹马》《芦花》《老井》《报纸》《星星一样的雪花》等一系列诗歌中,诗人都向我们展示了他那细致、独特的发现与编织诗意的能力。在他的笔下,希望与绝望并没有完全对立,黑夜和白昼也不是泾渭分明。或许这也正是黑小白诗歌的动人之处。(邹林超)

从“活出来”到“写出来”

——评郑欲翔长篇小说《紫金竹》

作家出版社近期出版了郑欲翔的长篇小说《紫金竹》,这是作者的处女作,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也是保山文学近年来的重大收获。小说的叙述是围绕生活项事展开的:食堂的菜不好,宿舍的灯坏了,学生的作业没交……它们占据了乡村教师90%的时间,没有什么“意义”,却构成了生活的“重量”。作者写苦,但不渲染苦;写美,但不美化生活。他只是把细节摆在那里,但正是这种“不说明”的姿态,让细节保持了丰富性。但写作的“内视角”也有一定的代价,最直接的就

是“距离”的缺失:作者缺乏一个可以把个人经验转化为普遍问题的观察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塑造,或者说,让小说人物少了一些深度剖析社会结构与人性向度的复杂性。从“活出来”到“写出来”,其间横亘着形式的鸿沟,而《紫金竹》是以一种朴素的方式自然跨过去的。一个把生命奉献给乡村教育30年的人,他最大的文学资源不是想象力,而是倾注了一生的情感和记忆。他把这些写下来,这样的文学,自有它独特的生命尊严和文学价值。(徐正伟)

写人 写水 写自然万物

——评韩玉洪长篇小说《长江谣》

近期出版的韩玉洪长篇小说《长江谣》,是长江生态题材文学创作的一部佳作。作品的突破性在于将叙事主体从“人”转向了“植物”——那些沉默地生长在长江上游险峻山林中的珍稀物种。小说以高雁鸿博士与杜水梹带领的植物科考队为核心,讲述他们深入素有“世界园林之母”美誉的山林,历经冰雪雪崩、群狼袭击等生死考验,采集珍稀植物种子,建立种子库,将濒危植株移栽至生态脆弱地带的故事。植物不再是故事的背景或点缀,而是叙事的

中心、保护的对象和价值的承载者。更为深刻的是,小说将珍稀植物的命运与长江生态修复的宏大进程编织在一起,全景式呈现了长江上游从脱贫攻坚到生态修复的艰辛历程。与此同时,小说直面三峡库区生态修复、乡村发展等现实议题。作品没有停留在对生态美景的抒情描绘上,而是深入生态修复一线,记录那些在险峻山林中默默坚守的科研工作者的奉献。这种将历史忧患与现实担当融为一体的叙事格局,使作品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实的体温。(肖思科)